

# 警惕民族主義成為主導意識形態

## ——與吳國光先生商榷

• 陳 彥

近年來，隨着中國經濟實力逐步上升，民族主義呼聲在中國國內甚至海外華人世界已勢如潮湧，漸成氣候。毫無疑問，如何應對和評判民族主義潮流的興起，是關係到中國近期未來立國興邦的最基本問題之一。

《二十一世紀》今年4月號以「中國崛起對世界的衝擊」為題刊出了一組評論文章，其中有吳國光先生的〈以理性民族主義抗衡「圍堵中國」〉一文，把民族主義作為抗擊西方（主要是美國）對中國的戰略圍堵的救世良方。將民族主義提到「理性」的高度，是民族主義思潮激盪的新表述，引人注目。儘管該文主要從國際戰略角度談民族主義，筆者也毫不懷疑吳文試圖疏導民族主義情緒並以此來配合制度變革的良苦用心，但讀後仍有些不同看法。本文擬從以下三方面同吳國光先生商榷。

第一，從世界戰略態勢角度，筆者不認為西方（包括美國、歐洲、日本）存在一個「圍堵中國」戰略對策，因而「對抗」的民族主義的前提並不存在。

第二，從概念角度，筆者以為民

族主義主要訴諸情緒，它的「理性」要求將本民族的利益看得高於一切，這一邏輯決定了民族主義本質上乃是一種非理性的思想潮流。

第三，近代民族主義產生及發展的歷程告訴我們，民族主義一旦成為主導的意識形態，就可能給本民族或他民族帶來災難性後果，這點尤其值得我們警惕。

### 「圍堵中國」的戰略是否存在？

關於圍堵中國，正如吳文指出，近年來，圍堵中國之言論常見諸西方報刊，在法國也可見到從英文轉譯而來的圍堵 (containment) 中國之字樣。然而，圍堵中國輿論的出現，是否就意味着圍堵中國戰略的形成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包括吳文也明確表示圍堵中國目前僅僅是一種輿論，「在政策層次上看，目前還不能說美國政府已經形成了『圍堵中國』的政策」<sup>①</sup>。

毫無疑問，中國經濟實力增強，軍力上升，是世界「中國威脅論」的現

民族主義主要訴諸情緒，它的「理性」要求將本民族的利益看得高於一切，這一邏輯決定了民族主義本質上乃是一種非理性的思想潮流。

實依據，但是怎樣對待這一「威脅」則沒有一個國際共識。如果說美國輿論目前還搖擺於「捲入」與「圍堵」之間的話，歐陸即使在輿論層面也沒有「圍堵中國」的喧嘩。可以預見，在未來十年，如果中國不發生以擴張為目的的政治轉向，即使美國有較成形的圍堵中國戰略設想出籠，歐洲也不一定會參與這一圍堵。

1995年7月5日，在台灣李登輝總統訪美及中國逮捕吳宏達使中美關係處於低谷之時，歐洲聯盟委員會推出了歐洲對華總體戰略，該計劃的總體指導思想是政治上與中國對話，經濟上加強和中國合作，力促中國盡快進入世界貿易組織。歐洲聯盟委員會主管世界貿易的副主席布列坦 (Brittan) 當時表示，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的作用正在凸顯，歐洲無任何理由孤立中國<sup>②</sup>。

歐洲這一不孤立中國的政策在法國總統希拉克上台以來有了更為明確具體的發展。今年2月底3月初在曼谷召開的歐亞高峰會議，今年4月中國總理李鵬訪法等，都一再表明歐洲決心大力「捲入」亞洲，而不是相反。

日本是美國在亞洲最重要的盟國，美國總統克林頓今年4月訪日，跟日本簽署了「美日安保宣言」，力圖強化美日的同盟關係。然而直到目前為止，與其說日本對華戰略的大方向是在美國主導下對中國進行「圍堵」，不如說是通過日美關係以「自御」。日本在華的大量投資、六四事件後日本對華極寬鬆的態度都表明，日本希望通過經濟「捲入」促成中國和平演變。今年6月底，日本首相橋本龍太郎到法國里昂出席世界七強峰會，力促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被輿論稱之為亞洲的代言人。日本身處亞洲，夾在

中美之間，地位十分敏感，其外交動向值得重視，但從其自身利益出發，同美國聯合以圍堵中國則並非日本目前的國策。

如果中國崛起僅僅是世界戰略構圖變化的一個孤立因素的話，西方世界聯合對付中國也許還是可以想像的，然而國際政治的現實卻是另一番圖景。東西冷戰結束以後，國際戰略構圖上的實質性變化有兩個：一是意識形態對立淡出，經濟競爭凸現，所謂地緣經濟時代取代地緣政治時代是對此形勢的一個很貼近的概括。二是以美蘇為代表的世界兩極對壘局面結束，世界發展呈現多極化的演變趨勢。可以說，國際政治版圖上的非意識形態化與經濟利益上升至主導地位的多極化，從根本上鏟除了西方結盟圍堵某一國家的基礎。

從中國本位立場出發，在世界多極化的今天，中國的崛起乃是天賜良機。這也正是本文同吳文的一大分歧所在。吳文斷言：「自90年代初以來，中國的國際環境進入了一個從70年代初期以來最差的時期。」<sup>③</sup>

我認為，70年代初期美國利用中國牌以圍堵蘇聯，中國是否曾享有優越的國際環境姑且不論，1989年六四導致中國國際環境惡化，完全是中國內部的突變事件造成的，隨着中國內部改革對此事件的消解，這種惡化自然會得到改善，這正是目前國際大勢所證明的，決不能說中國國際環境仍在不斷惡化。誠然，中美之間的利益衝突，造成兩國之間不斷地打打談談，然而以此來認定中國的國際環境惡化，一方面是只見美國不見世界的片面看法，另一方面則是仍然沒有擺脫冷戰舊秩序的過時論斷。

中國經濟實力增強，軍力上升，是世界「中國威脅論」的現實依據，但是怎樣對待這一「威脅」則沒有一個國際共識。如果說美國輿論目前還搖擺於「捲入」與「圍堵」之間的話，歐陸即使在輿論層面也沒有「圍堵中國」的喧嘩。

今年7月，美國為強化對古巴經濟封鎖而制定制裁第三國企業的有強烈霸權傾向的漢姆斯—伯頓 (Helms-Burton) 法，歐洲聯盟對此作出強烈反應，迫使克林頓簽字將該法生效期推遲6個月，這是歐盟團結反對美國霸權的一次成功。同時歐盟也得到了包括加拿大、南美、中國等的強力聲援。令人側目的是，美國總統克林頓正是在7月15日簽署推遲上述法案生效的前一天，對美國新有線電視台 (MSNBC) 發表談話稱美國應該同中國保持經常接觸，經濟制裁無益於中國的民主化進程。這是典型的「捲入」政策，同美國對古巴、利比亞、伊朗進行的圍堵政策形成鮮明對照。在美國大選的緊張氣氛中，克林頓宣稱無意圍堵中國，可見美國輿論並非全然倒向圍堵中國一邊。同時，歐洲反對美國圍堵古巴，不僅表明冷戰後的任何圍堵政策都已無基礎，而且預示了只要中國有積極主動、靈活的外交政策，就可以在一些問題上同歐洲、亞洲等國聯手反對美國的霸權行徑。當然這並不表示美國不會同歐洲聯手反對中國，但以各自利益為出發點的多極時代，更多出現的是以各國、各區域利益為轉移的權宜聯盟，而不是以意識形態為基礎形成的共同利益統一陣線。中國外交已經表明出的拉歐聯俄等戰略取向，可以被看成是一種維護國家利益、順應時代的明智之舉。

與吳文的判斷相反，我認為中國崛起於一個天下再分的多元時代，所面對的阻力和所帶來的震盪自然會緩和得多，這是上蒼給予中華民族乃至人類整體的福分。

站在本民族利益的立場上，對世界局勢作出清醒的、客觀的估計，然後決定本國對外政策，擬定相應的國

際戰略，確保本民族利益之發展，按照吳文的論述，這是「理性民族主義」的基本前提。然而，由於「圍堵中國」既非美國國策，更非西方各國的外交戰略，以此作為前提的抗衡的民族主義是不能成立的，即是說這種「對抗」式的民族主義本身缺乏理性的前提。

## 民族主義的幾種類型

法國有學者將民族主義分為三種：第一種是對自己所生長的國家、文化的認同和愛戴，是對其所屬的民族大家庭的自然情感，這是愛國主義意義上的民族主義。第二種是在爭取國家獨立，或國家主權受到威脅時反對外來侵略勢力，捍衛國家主權而激發出來的民族精神，這是愛國主義在特定時期的高揚，並隨着鬥爭的勝利而退居其次。第三種是以民族利益為依歸，將本民族的利益看得高於其他民族的利益，把民族利益作為高於其他一切價值準則的中心價值。這種民族主義作為一種政治信條，企圖為解決社會、民族問題提供總體解決方案，是一種「意識形態型」的民族主義<sup>④</sup>。

這三個層面的民族主義雖有性質上的不同，但三者卻有一種因果遞進的關係。愛國主義層面的民族主義是基礎，是民族主義的情感依據，它不僅可以在非常時期激發出不可估量的民族精神動力，也可以上升到一種極權性質的、政治信條的、意識形態型的民族主義。近代歐洲民族主義從發生、壯大到畸形發展，最後終於走向自我毀滅(如德國納粹、意大利法西斯的形成及其破滅)的過程表明：愛國主義層面的民族主義可以因其對本民族的過份的愛，而被引向意識形態

在以各自利益為出發點的多極時代，更多出現的是以各國、各區域利益為轉移的權宜聯盟，而不是以意識形態為基礎形成的共同利益統一陣線。與吳國光的判斷相反，我認為中國崛起於一個天下再分的多元時代，所面對的阻力和所帶來的震盪會緩和得多。

層面，成為專制、獨裁的工具，最終導致本民族和他民族的災難和毀滅。

民族主義不同於自由主義，自由主義以對個體自由的普世性、對經濟自由的分析的合理性作為其理論依據，它訴諸人類理性。民族主義也不同於共產主義，共產主義以追求人類地上天國的美好嚮往為其理想召喚，以理性的形式訴諸人的信仰需求。民族主義直接訴諸人類情感，訴諸人類近乎潛意識的愛憎等本能衝動，它不以理性作為基礎，也少有理想光彩。民族主義這一本質特徵使其難於單獨成為現代國家的主導意識形態，它雖有成就民族極權政權之志，但卻無一套能夠說服人的系統理論，更無一套成形的社會組織方式。因而，近代民族主義的形式和內容總是多種多樣的，它需要同其他政治社會思潮結成統一戰線。同時，由於民族主義的無限豐富的集體情感土壤，其他政治思想潮流也需要借助它的力量。這是近代世界範圍內的民族主義總是同其他意識形態體系共生共長，而衍生出各種各樣的民族主義之故。

民族主義雖然可以同各種不同的價值準則相結合，形成種類各異，甚至性質不同的民族主義理論或潮流，但其基本點是以地域為單位的某種文化、歷史因素(如部落、語言、宗教等)為基礎的。這就形成了民族情緒的外部參照系問題。由於民族主義以重視本民族之利益為宗旨，因而使民族與民族之間的關係處於一種對抗、宰制與反宰制的緊張中。

在民族危亡、社會變動的年代，對本民族的愛、對本民族利益的捍衛，往往同對民族敵人的恨、對妨礙本民族利益的實現或同本民族利益相競爭的他民族利益的排拒相反相成。

這種民族主義較容易突破愛國主義的民族情感，走向極端的民族主義形式，深刻地影響官方意識形態，並成為在全民族佔支配地位的思想潮流。這一意義上的民族主義，不僅可以激發出不可估量的社會動力，同時也潛伏着深層的災難性的社會後果。這正是上述意識形態型的民族主義。

本文正是從這種旨在影響國家意識形態或者已經成為國家意識形態的民族主義的意義上使用「民族主義」這一概念。縱觀整個西方近代歷史，民族主義基本上是一個負面的體系，它給人類帶來的禍害和災難遠遠大於其建設功用。

十九世紀是歐洲民族主義激盪昂奮的時代，其時英法利用民族主義繼續進行殖民擴張，德意則鼓譟民族主義以實現民族國家的建立。英法的民族主義是開放的，尤其是法國民族主義以法國大革命的思想口號為號召，在形成了擴張的民族主義一拿破崙主義之後，由於普法戰爭戰敗，丟失阿爾薩斯、洛林兩省，擴張的民族主義轉向保守、對抗，並產生了德科比諾(Arthur de Gobineau, 1816-1882)這樣的種族決定論的始作俑者<sup>⑥</sup>。同樣，德國思想家赫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 1744-1803)、費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 1762-1814)鼓吹以種族、血緣、語言和文化劃分的封閉的民族主義<sup>⑦</sup>，為俾斯麥統一德國提供了理論武器，同時也為日後納粹種族主義植下了思想淵源。一戰的爆發，德國民族主義與法國民族主義都難辭其咎，甚至可以說，一戰本身就是歐洲民族主義惡性發展的一個邏輯演繹。可悲的是，民族主義不僅沒有因為一戰落幕而告消退，反而由於凡爾賽和約劃分世界勢力範圍不均而獲得

民族主義直接訴諸人類近乎潛意識的愛憎等本能衝動，而近代民族主義的形式和內容總是需要同其他政治社會思潮結成統一戰線。這一意義上的民族主義，不僅可以激發出不可估量的社會動力，同時也潛伏着深層的災難性的社會後果。

了充足養料。德國、意大利、西班牙的民族主義在兩次大戰的空隙中獲得了空前發展，終於引發了比一戰更為慘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戰。而德、意、西各自的民族主義都被推向其最為極端的形式——希特勒的納粹主義、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義及佛朗哥主義。

民族主義作為一種以集體情感為紐帶的思想體系和政治運動，有着自己的內在發展邏輯。西方民族主義發展的歷史表明，開放的民族主義的演變發展會導致擴張，產生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封閉的民族主義的極端演繹則導致種族仇殺、種族清洗，產生法西斯主義與納粹主義。在亞洲，日本軍國主義給中國人民帶來過深重災難的日本侵華戰爭，也同樣是民族主義惡性膨脹的結果。中國近代史上滿清統治者閉關自守的、愚昧的民族主義、義和團式排外仇外的民族主義，乃至改革開放前在文化大革命中達到極致的既閉國封關又幻想輸出革命的狂妄的民族主義，都給中國國家的強大、人民的自由增添了障礙，最終推遲了中國現代化的實現。亞洲及中國的歷史教訓，尤其值得我們於今天討論民族主義時一思再思，反覆檢討。

## 理性民族主義並不理性

對民族主義的歷史作出上述基本否定的描述和評判，並非危言聳聽，也非對今天中國民族主義潮流的復歸不加疏理分析而一概棄之。愛國主義意義上的民族主義及抵抗侵略的民族主義是一個民族存在、凝聚、發展、自衛的必要條件，不僅不應反對，而且需要珍視。但這種珍視不是無條件

的，一方面，愛國主義的內涵必須有清楚的政治和文化的界定；另一方面，要警惕濫用愛國主義的企圖，將愛國主義推向民族主義。這種濫用的結果，將既為民族主義提供感情資源，又摧垮愛國主義民族凝聚力的積極功用。在國家無外患、民族無外憂的和平時期，高揚民族主義自有其充當國家政治主導的野心。目前，中華世界興起的民族主義潮流之所以引起重視，正是由於這一民族主義正在填補或者企圖填補共產主義淡出後的意識形態真空。民族主義的價值準則——民族強盛、國家利益——正在替代革命的國際主義，進而成為中心的、唯一的價值依歸，這是一個十分值得我們警惕的危險傾向。

近代以來，民族主義只有在下述兩種特定情勢下才具有積極意義：一是第三世界衝破殖民主義枷鎖，要求國家獨立；或者是一國反對另一國的侵略戰爭。中國近代民族主義思潮的主流具有這種性質，它對中國擺脫晚清封建統治，建立現代民族國家具有積極的意義。然而，目前中國既無國家獨立問題，又沒有主權受到侵略的問題，鑒於目前中國特定的政治形勢，宣揚愛國主義本身就超出了對中國文化語言的愛戴，和對祖國河山依戀的自然情感的範圍；而高揚民族主義大旗更是一種政治行為，一種加強現政權合法性和尋求國家認同的意識形態行為。這同近代中國以梁啟超、孫中山為代表的主流民族主義有質的區別。

另一種情況是法國大革命時近代民族國家起源時的民族主義，有人將這種民族主義稱之為近代民族國家的立國精神<sup>①</sup>，它有其特定的含義和特定的對立面。這時的民族(nation)是

目前，中華世界興起的民族主義潮流之所以引起重視，正是由於這一民族主義正在填補或者企圖填補共產主義淡出後的意識形態真空，進而成為中心的、唯一的價值依歸，這是一個十分值得我們警惕的危險傾向。

以舊時代的王權作為對立面，是一種民權主義，將人權、個體自由等價值準則作為其基本的內涵。這樣一種理想的民族主義，只有在英法這類現代普遍價值準則的起始國才是可能的，因為這裏不存在西方價值的本土化與本土的現代化這類尖銳的歷史矛盾。

歐洲民族主義的歷史教訓之所以特別值得我們借鑒，是因為近代歐洲是民族主義的發源地，民族主義在歐洲已經走完了一個生命循環。從法國革命開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法德民族主義的膨脹，再到希特勒的納粹主義，歐洲為民族主義提供了充分的表演舞台，民族主義也在此為人類帶來了空前的大災難。戰後歐洲政治界、思想學術界對民族主義的發展機制及其危害作了大量研究和深刻反思<sup>⑥</sup>，但歐洲的民族主義並未因此而理性化。冷戰結束後，世界範圍內民族主義復興、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泛濫、非洲部落間的毀滅性殘殺、波斯尼亞的種族清洗、德國新納粹、意大利新法西斯的回歸、西班牙巴斯克、法國科西嘉島以民族自決為訴求的恐怖暗殺、法國鼓譟種族歧視的民族陣線的選民市場的擴大等等，都表明民族主義是一頭難以被理性馴化的野獸。一遇經濟危機、政治危機、信仰危機及社會轉型、時代變革的關頭，民族主義就陣發性地以各種極端的形式表現出來。

在今天的歷史高度，以理性的立場來對待民族主義，當然需要對民族主義給予理性的制約，但卻不應給民族主義套上「理性」的光環。問題的關鍵是到底有沒有理性的民族主義？

吳文對其「理性民族主義」作了一個十分清楚的定義。吳文說<sup>⑦</sup>：

所謂「理性民族主義」，就是承認民族特性的存在與民族利益的衝突，不以某種抽象價值否定民族特性與民族利益；反過來，也不以民族特性否定某種價值，而是主要以民族利益的實現為標尺來決定價值與特性的取捨，直至變革本民族以實現民族利益。

按照這一定義，理性的民族主義是以民族利益的實現作為最高準則的，為了實現本民族的利益，不僅可以拋開任何價值準則，也可以拋開民族特性。我們可以說，這是一種利益至上的民族主義，一種純功利的民族主義。假如理性就是實現功利的代名詞的話，我們倒可以將這種民族主義稱為「理性民族主義」。

無論是功利的還是「理性」的民族主義，都要服從民族主義的兩個基本內在邏輯。一是從本民族利益出發，以最大限度地實現本民族利益作為其職旨，並以此為準則來處理和其他民族的關係。各個民族均可以設定自身的民族利益目標，但問題是怎樣保證一個民族的目標不會侵犯另一個民族的利益？民族主義作為意識形態是沒有這方面的資源的。民族主義不僅不能解決民族與民族之間、國與國之間可能出現的摩擦和衝突，而且還會為一個民族宰割、統治另一個民族提供合法根據，從而使民族關係處於對立、衝突之中，這是一種對抗和戰爭的邏輯。

民族主義的第二個邏輯是集體主義的邏輯。民族利益至上，集體壓倒個體，以民族的名義要求個體無條件地服從，以集體的名義發出統一的號令，窒息自由多元的聲音。這是一種為專制、極權提供基礎的邏輯，是同民主、自由格格不入的。在民族利

民族主義具有集體主義的邏輯。民族利益至上，集體壓倒個體，以集體的名義發出統一的號令，窒息自由多元的聲音。這是一種為專制、極權提供基礎的邏輯。

民族主義代替共產主義成為官方意識形態的前景，既不能給人民帶來自由、民主，也不能保證國家的健康發展，到頭來仍會將中國的現代化引向歧途和迷茫。

益、集體意志至高無上的原則下，個人的權利、財產、聲音還有甚麼地位？在這種民族主義統治下的國家裏，即使實現了民族利益，恐怕也不是以千千萬萬微不足道的個體所組成的民族的福祉。中國近代自由主義聲音之微弱，近代人物包括嚴復、孫中山等身上的民族主義傾向最終壓倒自由主義傾向，都證明中國民族主義對自由主義、多元精神的巨大抑制和排拒力量。

中國目前確實有一個進一步改革開放、進一步加強國力、實現富國強兵的現代化之夢的問題，但這都不應該以放棄自由民主為代價。今天的中國畢竟已經掌握了國家主權，不再是救亡壓倒啟蒙的時代了。中國的近代化歷程告訴我們，強調集體、壓抑個人、崇尚單一、排拒多元的民族主義往往是既犧牲了個人自由，又葬送了民族利益。退而言之，一個沒有個人自由、人的尊嚴被踐踏的文革式的社會，即使有了主權獨立和民族強盛，恐怕也不是中國現代化所追求的社會境界。

西方近代政治史可以自由主義、民族主義、社會主義三種意識形態的更替交織的歷史來釋讀。自由主義以個體作為最高的價值準則，成為民主的基本依據而有效地防止了專制和極權；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都強調集體價值，往往結成同盟軍，同台演出，給人類製造了一幕幕歷史慘劇。中國目前正處於社會轉型的歷史時期，原有的官方意識形態正在淡出，新的意識形態正在乘虛而入，可以斷言，以一種集體主義的意識形態代替另一種集體主義的意識形態，其間一定有捷徑可走，民族主義在此時獲得官方青睞，決不是偶然的。然而，民族主義

代替共產主義成為官方意識形態的前景，既不能給人民帶來自由、民主，也不能保證國家的健康發展，到頭來仍會將中國的現代化引向歧途和迷茫。剩下的還有一種選擇，那就是超越民族主義的桎梏，認同世界共同的價值準則，走以人權、自由、民主立國之路。

### 註釋

①②③ 吳國光：〈以理性民族主義抗衡「圍堵中國」〉，《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96年4月號，頁26；32；31。

② 參見拙作：〈歐洲對華新戰略與歐中美三角關係〉，《信報》（香港），1995年7月18日。

④ 主要參見Jean-Luc Chabot: *Le Nationalism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95).

⑤ 科比諾的主要種族主義言論，集中在其1853-1855年出版的《論人類種族不平等》一書中。

⑥ 赫德於1774年在其《人類教育的分類歷史哲學》一書中提出了共同血緣、共同語言、文化的民族概念，開德國種族民族主義的先河。費希特1807-1808年在柏林大學的十四篇講演集《告德意志國民書》（*Reden an die deutsche Nation*），為德國意識形態的民族主義奠定了理論基礎。

⑦ 英法古典自由主義思想家如托克維爾、亞當·斯密等都有此類論述。

⑧ 此類著作汗牛充棟，較著名的有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3); G. Delanoï, P.-A. Taguieff: *Théories du nationalisme, nation, nationalité, ethnicité* (Paris: Kimé, 1991); Raoul Girardet: *Le nationalisme français* (Paris: Edition du Seuil, 1983); Francois Furet: *Le passe d'une illusion* (Paris: Robert Laffont-Calmann-Lévy, 1995).